



辛亥首義回憶錄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

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亥首义回忆录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辛亥首义回忆录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3插页 118,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2版

1980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9,600

统一书号：11106·54 定价：0.55元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十日(第六十號)

本館開設武昌省城內 每日式大張

中華民國公報

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 為

布告大漢同胞事昔我皇祖皇帝軒轅氏世有中土建國萬區必先南討蠻尤北逐獯鬻作孤矢以威四裔周鼎保我子孫聖民少昊高陽繼之以至唐虞亦先分北三面尊乃聖民於蠻若夫鬼方逆命商則征之疆於南後周寶遜之匈奴光胡內寇如秦如漢而滅之由是以觀可知夷狄大防我歷代聖人之必嚴且厲者誠以神明之

賞格

如能取瑞 徵蔭昌 以及 張彪
首級來獻者 賞銀一萬兩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日示

陸軍第二病院成立

陸軍第二病院已奉勅組織齊全設立三佛閣內銀元局街第八號大宅以便病傷軍士就診特此廣告
院長王紫槐白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 為

嚴飭巡邏事照得軍政府慎防流弊政府佔據中軍政治各局視喪失主權舉動偵探報復貪婪等情已請之金其財產者計吾民之熱心義舉斥志士為嚴厲目公論為嚴懲嚴辦並設人既於本軍軍政府前於八月

武昌起義后出版之《中華民國公報》，用黃帝紀元，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黃帝紀元四六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創刊。党人牟鴻勛任經理，張樾為主筆。

中
華



李暢軒

監印官李暢軒

武昌起义时所用之印，
文曰：“中华民国鄂军政
府大都督印”。



上为武昌日知会创始人刘静庵遗像。刘于一九〇六年冬被捕，一九一一年死于狱中。其革命事迹详见本书殷子衡、范腾霄两先生回忆。



上为刘静庵手书对联。原挂武昌高家巷圣公会内，一九〇六年日知会被清吏破坏，文华学生卢春荣暗中携出，珍藏至今。一九三八年张难先为之钩摹副本，一九五五年捐献武昌东湖行吟阁。联上小字即张所作跋语。



左为刘静庵被清吏残酷刑讯时，鞭背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不得已而衬于背上之汗巾。其后，刘静庵、殷子衡题字其上。“保罗”即静庵，“勤道”即子衡也。



梁钟汉、向岩、殷子衡、吴昆、刘公开、张难先（自左而右）诸老人在刘静庵墓前摄影。时为一九三五年。



武昌起义，清吏狼狈登车逃走情形。

目 录

狱中记	殷子衡 (1)
潘怡如自传	潘康时 (33)
记文学社	潘康时 (56)
辛亥首义前后	范腾霄 (64)
辛亥武昌首义真象	黄元吉 (84)
辛亥阳夏光复史略	邱文彬 (98)
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	方孝纯 (105)
回忆祁国钧烈士	江炳灵 (118)
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	朱峙三 (125)

狱 中 记

殷 子 衡

〔按〕殷子衡，亦作子恒，教名勤道，又号蕺园，湖北黄冈人。自幼好学，治时艺及诗、词、歌、赋等，曾应县、府、乡考试。后专治格致、舆地之学，以三年工夫，绘成一幅六洲地图，用梨木刻成，便于熟悉世界大势。既尽读戊戌变法以后所出革命书报，深感非推翻清朝政府不能革新政治，于是参与革命运动。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丙午冬）初被捕，辛亥武昌首义始出狱，先后在汉阳和黄冈参加革命政权工作。以有感于时事，遂于一九一二年在汉口圣公会受洗，从此一直为教育和宗教事业服务。因早年牢狱生活，晚年致患癱症，其女昭素侍奉惟谨。延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逝世前为湖北文史馆馆员。本篇系据其旧作及口述编成，所记狱中情形，最为确切。

一、参加革命动机

我参加辛亥革命的动机有三：其一是从留心时务而起。看见清朝的官吏多半是文酣武嬉，昧于世界大势，每次与各国交涉，总是失败。如鸦片战争失败后所订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后所订的天津条约、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订的

马关条约，以及八国联军蹂躏北京后所订的辛丑和约等，都是我国奇耻大辱。益觉清政府没有力量办理国事，遗害百姓无穷。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动机。其二是从读书有感而起。少年读《易经》至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者，改也，除去之也；命，是天命。《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能激发人的革命思想。这一类的话给我的影响很深，使我觉得吊民伐罪是人人应该做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二动机。其三是受“慈悲心”的驱使。我从小直到二十多岁，看见受苦的人，心中就非常难过。这种同情心主要是家庭教育所致。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读了十几年的书^①。每天夜晚他总要读一点多钟的书，并且是用大声音读。我在小时听见他所读的书，到如今还记得几句。他读：“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又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并且讲给我听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我们大家都有份。只要有德行，个个人都可以做皇帝。”又说：“蓬蒿长在麻的中间，不必去扶它，它自然会直的，因为麻是直的，也就把蓬蒿带直了。白沙落在泥巴里，不必去染它，它自然会黑的，因为泥巴是黑的，也就把白沙带黑了。”这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坏人，跟着好人也会学好的；一个好人，跟着坏人也会学坏的。他所交的朋友贫富皆有。他说，人类应该一样看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的母亲，也是主张慈悲为本，她总是教训我要行善，不可

行恶。这些教训沁入我的脑间，不易磨去。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三个动机。凡属有志于革命的人，我就跑去找他，若熊芷香、何季达、吴寿田、朱松坪^②、刘静庵等，我都与之时常见面，讨论一切。自从我刻了“六洲舆图”以后，就用原有的工匠，在秘密处所印刷革命反清的书籍。有的是翻印的，有的是自己和同志们编辑的，如《德占辽东》、《黑龙江》、《警世钟》、《猛回头》、《破梦雷》、《作新民》、《训兵谈》、《孔孟心肝》，以及老同志张纯一君^③交给我代印的军歌，等等。印成以后，我就坐小火轮送至武昌高家巷圣公会内的日知会，交与刘静庵，再由刘静庵交与朱松坪等，秘密分散于军学界。凡属表同情于革命运动的人，看了我们印刷的书本，没有哪一个不参加革命的。有一次，我叫人背着一包袱革命书本和传单，同我一路到乡村里去分送。随时演说清统治者如何专制，如何残暴，也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讲给人们听，为的是要激起众人的爱国心，从事于革命工作。听众中有一个人认得我，他劝我说：“你不可太激烈了，怕的遭杀身之祸呢。”我当时回答他说：“恐怕我没有杀身的资格啊！我们处在二重奴役枷锁下过日子，有甚么意味呢？与其含羞忍辱，偷生世上，不如轰轰烈烈与清廷大战一场而死还好些。”那位胆怯如鼠的读书人，听了我这几句话，就抽身走开了。（辛亥武昌首义以后，听说这位劝我莫革命的朋友，也跑到黎元洪那里当秘书去了。）众人也随着他散了。我就乘便到黄州城里去，寄寓孝介祠黎宅。有要去谋刺铁良的王怒涛来会我，我即与他筹划一切。总是想把清统治者推倒，把四万万同胞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二、被捕入狱

我为甚么事被捕入狱呢？就是因为运动革命的机关——武昌日知会破了案。刘静庵等先后入狱，我也随着被捕了。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初四日，法国国民党的领袖欧吉罗（系孙中山先生派来的）由烟台拍电报到武昌日知会，定于本月初八日到武昌来。我就与刘静庵、朱松坪、季雨霖等商量怎样欢迎。到了初八日，欧吉罗果然来了，到会的人约有数百。欧吉罗演说，朱作梅翻译，言辞激烈，听众多受感动。后闻会场中有清巡警道冯启钧派来的侦探，密查日知会究竟有无革命的举动。恰逢是年八月萍乡、醴陵起义，势焰很大，湖北的官员说日知会是和他们联络一气，实行革命的。冯启钧就派兵包围日知会，捉拿刘静庵，把他关在监狱里。朱松坪、胡瑛、季雨霖、梁钟汉、李亚东、张难先等，也就先后被捕入狱了④。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历丙午十二月十三日），何季达由省城到团风小学校里找我（此时我在该校教地理兼国文）。何君走进校门与我见着面，即牵着我的手到操场角去，边走边谈，向我说：“我们革命机关破了，静庵、松坪等都被捕了。你可到日本去躲避一下。本月二十日，胡维世要来约你的，你暂且在这里等候几天。”我听了 he 这一段话，起居坐卧总觉不安。到了三十一日（十八日），有鸭蛋洲的霍雄飞与学校附近的秦少溪，约我出外走一走。我就同他们走了好多处所，转身到紫荆山庙中商筹一切，并在道人那里吃晚饭。约午后四点钟，我们三人站在神龛前谈话，忽然有两个穿便

衣的人从侧门里进来，问殷先生在哪里？我看见这两人是从来没有会过面的，心中很疑惑，猜想是拿我的人来了，就连忙扯谎答应他们说：“殷先生不在这里，他回家去了。”我就转身向后门外边走，秦君也跟着我走出来了。（后来听说：那两个侦探见我走后，又曾追问那庙中的小道人。小道人指着我说，那前面走的就是殷先生。）在回转学校的路上，忽然看见体操场中站着一队兵，心中越发怀疑，很想几步走到人家屋里去躲一躲。不到几分钟的时候，那先前问我的两个人从庙里跑出来了，口里连声喊：“殷先生，殷先生！”我听见他们喊，明知躲不脱，就只有答应说：“你们喊我有甚么事？”我口里一面与那喊我的人讲话，一面以目示意，嘱秦君快快走开。秦君见此情况，就从岔路逃走了。那操场中站着的兵士，有一个抢步跑拢来，开口问道：“你是殷子衡先生么？”我说：“是的，你们找我做甚么？”那个兵士说：“张官保（按：指张之洞）有命令，特派测海兵船叫我们来请先生到省城里去。”随后那些兵士都跑步赶到我面前来了，有的用手捉住我的臂膀，有的牵着我的辫子。我说：“你们不必如此，男儿救国，岂爱惜生命么？我去就是了。”他们才把手松开，许我往前走。走到江边，踏上兵船，看见我的舅父吴贡三先生已经在仓中坐着了。我与舅父对坐，没有一句话说。远看太阳渐渐要落土了，暮色苍茫，令我百感交集。我自问自道：“我若是死了，从事革命的人岂不是少了一个么！我若不死，我这患病以后的身体，又怎能受得住他们残酷的刑杖呢！”左思右想，觉得生则为其难，死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船过白浒山下，我就跳入江心。清兵见我跳水，赶忙将兵船转过头来，驶近我的身边，将我从水中提了起来。他们脱去我的湿衣服，送我到

火仓里去烤火，并用四个强壮的兵丁看守我。我如醉如梦，不知东方之既白，直到看守的兵叫我起来，才惊醒坐起。我的舅父吴贡三先生也起来了。岸边有两顶轿子在船侧，我与舅父各坐一顶，从汉阳门进城。轿子走得很快，径抵一座公馆门口。我们下轿后就步行进去，看见门内两边排列刀斧，威武异常。走过花园，到了一间屋子，环列许多兵卒。过一会，屋子内面走出一个人来，大约有三四十岁，面白无须，穿的皮袍子和缎子马褂，口里衔着烟卷，鼻子上架着金丝眼镜，用好言饵诱我们说：“你们不要紧。不过要你们证实刘静庵是日知会的‘匪首’，把他的罪状都说出来，就可以放你们回去。此案与你们没有干涉。”当时我觉得他是向我们诱供，我岂肯把千斤的重担，推在刘一人身上，自求释放？我就支吾其辞。那个问我的人，听见我这样答应他，很不高兴，就叫人拿出纸笔来，要我写日知会的始末。我因这样关系很大，明知已经被捕的人是无法可逃的，未被捕的人，岂可任其罗织！遂信手涂鸦，所答非所问。那人以不得真情，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就走开了。那人走开以后，内面又走出一个人来，面色黄黑，头颅很大，身材魁梧，穿的是军服，手中拿着两尺多长的木棍，走到我的面前，用各种手段恐吓我。我就闭着口，一句话也不说。那个穿军服的人看我不说话，就把我和我的舅父带到警察局里去了。这时约午后一点多钟，这里预备了午饭给我们吃。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守卫兵士对我说：“这里有一个胡瑛，听说是与你们一党的，他很会做诗。”他出门去四处一望，转身就把胡瑛做的诗念给我们听。我听了胡瑛悲痛的诗句（胡瑛被捕后数日，有拟斩讯，故于狱中赋诗，以示绝笔），心中越发难过。到了午后

两点多钟，那个拿木棍的人引我们出外坐人力车子往前走。走到长街，遇着同邑的冯群仙。我不与他说话，即怒目示意，叫他赶快走。我们的车子走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武昌府的衙门口，那人把我们引到靠右边的屋子里坐着。有好多人问道：“是甚么案子？”看守的人答应他们说：“这是昨天在黄冈县拿来的两个革命党，与刘家运、朱子龙是一案的。”于是众人拥挤着，攒头瞪目的看着我们。有的说：“可怜啊！”有的说：“他们想杀皇帝哩！”有的说：“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革命呢？”当时，我看着那些人，有很大的感触，心中默默的向他们说：“同胞们！你们常受统治者的压迫，到如今还不觉悟，实在是可怜极了。”过了一会，就把我们提进内堂，坐在走廊下候审。又坐了许久，觉得太阳已落了土时，堂上的灯点着了，呼喊的声音不绝于耳，想是预备法堂审判我们呢。我过细的思考着，若是只为我一身打算，死于刀下倒是极爽快的事。又想，这未免太软弱了，对于同胞太不负责了。要从万变中灵活机智，保全生命，将来更好的做革命工作。这样，我的胆气就增加百倍，一点惧怕的心也没有了。于是抬起头来朝上望，看见堂上的差役往来如织，三五成群的唧唧啾啾，声音莫辨。

约过一点多钟，差役把我们引到审判的堂前。堂上陈设着长案一张，案上排着冬瓜式的琉璃红灯一对，笔架、签筒各一。案后当中坐着的是清巡警道冯启钧和武昌知府双寿；案侧坐着的是江夏知县王士卫。先提我的舅父吴贡三先生审问，审毕，另押一处。再提我到他们面前审问，我就盘脚坐在地上。开始由冯启钧审问：“你是殷子衡么？”我说：“是的。”冯问：“你有几大的年纪？”我说：“今年三十二岁。”冯问：“你平

素做些甚么事？”我说：“我平素喜欢读书，以教书为职业。”冯问：“你为甚么与刘静庵提倡革命呢？”我说：“我国的疆土，被清统治者占去二百多年，政治非常的腐败，人民非常的痛苦，做官的人又没有甚么知识，我们想改革专制的政体，建设共和的国家。”冯问：“你们想在几时起事呢？”我说：“我们不过只有这样的思想，还没有甚么行动。”冯问：“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么？”我说：“不是，他只有一个名字，叫静庵。^⑤”冯问：“日知会是刘静庵创办的么？”我说：“是的。”冯问：“他办日知会是甚么作用呢？”我说：“日知会的宗旨，是想把欧美各国的文化搬进中国来。里面陈设新书、新报和外国的书籍，所以有军学两界的人常常进出。”冯问：“前者萍乡、醴陵叛变，是不是刘静庵的指挥呢？”我说：“不是。”冯问：“你何以晓得不是呢？”我说：“从来没有听见说过。”冯说：“你袒护他。”继而又喊：“你们拉骊子来，把他骊起，看他照直讲不照直讲。”那些站着的差役，就把我抬到骊子上，把我的左右手拴在两旁的木柱孔中，把我的辫子悬系在骊子上。又有一个走拢来，折我的双膝盖跪在铁链子上，后用长棍垫于两脚之颈，二人用力上搬，实在是痛不可耐。双寿前来对我说：“你讲，你讲，你只讲萍醴的革命军是刘静庵的党羽，刘静庵就是刘家运这几句话，我们即刻放你回去。”我总不开口，双寿又对我说：“这种痛苦是很难受的，你讲，你讲，我们即刻放你下来。”我忍着痛，还是不开口。在骊子上约有半点钟，他们才把我放下来，我把脚伸开坐在地上，脚颈、膝头、两膀骨肉，遍身都痛，心中焦灼，如同火烧一样，悲极愤极，几不欲生。王士卫斜坐案旁，先用好言劝慰我说：“你要放明白些，这件案子与你毫无关系。听说刘静庵是长江上下游的

匪首，势力很大，军学两界他已联络好了。准备几时起事呢？你对我说实话，马上就放你回去。”我听见他用这种欺骗的话来诱我入壳，愤怒不能自禁，打算死在他的刑杖下，就放大声说：“你们想把别人的血来染自己的顶子（清廷官制，能多杀汉人立功，升至头品顶戴者，赏红顶），那是不可能的事。甚么长江‘匪首’，我一概不知。”王士卫看见我说的话太厉害，他就变了脸说：“我和你说好话，你还发气么！”他又喊：“再把他绷起，拿条子来鞭他的背，看他照直讲不照直讲。”于是差役就把我的衣服脱掉，只留单裤一条，依然把我绷起。皂隶左右站着，有两个差役拿着一把细竹枝的条子打我的背。那两个人的气力很大，对面更换着乱打。打至数百下，血流如注，痛入肝脾。王士卫、双寿、冯启钧三人先后到我的面前，带着笑容对我说：“你照直讲，免得受刑呵。”但刘静庵是我们的同志，我不能说他是“匪首”，使他身遭惨戮；也不忍说出同党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他们看见我不肯说，用刑就越发厉害。我的血肉横飞，头上的冷汗不住的往下流，鼻子内的呼吸也非常短促，四肢百体，都失了常态。这个时候，我以为不能再活了。他们看见我要死的样子，就叫人把我从绷子上解下来，我好象从死里复活一样，又把脚伸开坐在地上。差役中有一人用自己的脚摩擦我的膝头，我的心还是跳动不止，身体麻木，不知疼痛。忽有警士前来向冯启钧报告：“某处的墙倒了，压死好多人，请大人前去相验，以免途人堵塞，致起惊慌。”冯就当时退堂，左右的差役把我扶到帘子外面，坐在一矮凳上，给我汤饭一碗。我仅喝了几口水，饭一粒也吞不下去。过了一会，气息稍长，心跳略缓，似有一线生机。在我以为必死，忽然活转来了，可算得不幸中之